

陶行知年谱

重庆师院 仲兰邨
安徽师大 晋启生 编著

(征求意见稿)

重庆师范学院科研科

前 言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也是杰出的民主战士、思想家、人民诗人。他为人民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一篇教育史诗，堪称人民教师的典范。

行知思想的特色是民族性、人民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他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经过晓庄学校、上海普教的过渡期，转变为一二、九运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者、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政治思想发展的同时，认识论和教育论也相应地发展。他由唯心论转变为唯物论、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到接受科学的辩证唯物论。他的生活教育论由南高任教到晓庄创校的胚胎期，经过乡教运动、普教运动的发育期，而发展到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的成熟期；而成熟期的重要标志是把人民大众教育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结合，用人民教育为革命斗争的武器。他的思想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与时俱进，乃是由于他在生活实践中思考创造，坚持教育科学实验，虚心向大众学习，这些是他的思想永不枯竭的源泉。

行知思想是一份宝贵遗产。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准确地予以评价、发扬光大，克服局限，以为建立我们自己的教育科学体系的资料；并为教育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服务。要把行知思想与社会主义实际结合起来，提取适合当前实际需要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经验，

进行专题探讨和教育试验，以便检验总结，发展提高。刘季平同志建议上海搞生产、学习、科研三结合的社会主义工学团试验，如能实现，那是良好的开端。

这本年谱简要地叙述和考定了陶先生的生平，选录了他的教育诗文精华，可以作为学习和认识陶先生的初阶，也为将来写较详尽的谱传的基础。年龄均用虚岁计算。纪时无确定月期者，附于月末；无确月份者，附于年末。诗文一般采用发表日期。

我俩是陶先生创办的第一所学校——南京安徽公学的学生，对这个时期能回忆的较多一些，其他各时期则亲知较少。除依据陶先生原著外，多得之于参观、谈话，更多的是亲承陶先生教海的各校同学的回忆录、大事记所提供的宝贵资料，谨致谢意。史实与看法可能有误，望加指正。

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于重庆

陶行知年谱

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 辛卯）一岁

陶行知先生十月十八日（农历九月十六日）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九五三年作者曾访黄潭源村，在五柳巷西面有旧式两开间小楼，据说是陶先生童年青少年时期故居。晓庄学校第一期同学王琳曾亲见陶先生填写简历为黄潭源村。各家《年表》写成王墩源村实误。）原名文濬，乳名和尚，后改名知行，又改名行知。

先祖明末在河南信阳一带做小官，清军入寇，弃官避居黄潭源村。建五柳祠，居草庐，庐畔称五柳巷（又称陶家巷）。

父名槐卿，字任潮，原在休宁万安街经营酱园，破产后务农，母曹翠舫是慈祥勤俭的农村妇女。兄姊早故，妹文溪。清贫的家庭生活，使行知幼年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惯，朴素的作风和劳动人民的感情。

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 丙申）六岁

任潮公教识字，畈村塾师方庶咸，不收束修，代为开蒙。

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 丁酉）七岁

万安街外祖父母留行知在塾师吴尔宽家伴读。他素质优越，聪明勤学，相传曾在三刻钟内熟读背诵四十三行《左传》，数年后回黄潭源村，在父亲指导下自学。常挑菜进

城，探望在崇一学堂做炊事和勤杂工的母亲。

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 丙午）十六岁

入歙县内地会教堂办的崇一学堂，三年课程，二年结业，奠定了英文、算学、自然科学的良好基础。是时歙县西干十寺的和尚，勾结官府，鱼肉人民。行知与同学朱家治等把沿河的菩萨摔入河中，为民伸张正义。

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 己酉）十九岁

春，任潮公在“古城岩下，水兰桥边”，送行知搭上开往杭州的帆船。他与同学章文美同时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学习半年后，因该校歧视不信教的学生，他不肯低头让红衣牧师划十字，毅然退学。到苏州表兄张志暴家，度了半年饥寒交迫的生活。少年时期的陶行知即表现出无神论的思想和出污泥而不染的精神。

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 庚戌）二十岁

行知得崇一学堂校长唐俊贤之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发展个性的理论，影响了他的思想，因此改名知行。（陶行知：《知行行》，《生活教育》第11期，1934年7月16日）（行知说：“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 辛亥）二十一岁

行知在辛亥革命时期，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主编

金大校刊《金陵光》，组织爱国讲演，举办爱国捐款，宣传和推动民族民主革命。他参加社会活动，而认真学习钻研，专习文科，而自学数理，能为理科同学解决数学难题，做到了文理并进，行知统一。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 甲寅）二十四岁

提前一年以第一名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系。（《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传记》，有1914年崇一中学师生贺行知大学毕业集体照为证。但黄炎培先生《哭陶行知先生》诗中有“秀绝金陵第一声”句，自注云：“民二先生以第一名陶文俊毕业金陵大学。”有的年表本之，说是1913年大学毕业。作者认为1913—1914年行知未参加工作，亦未见任何行事，而当时学制是大学六年，1914年毕业也仅学习四年。因此，暂定为1914年大学毕业。）全家迁居南京。与曹纯宜结婚，她是朴厚的女子，妹文谟汇文女中的同学。行知献身教育事业，她们分担了不少辛劳。

金陵大学校长包文保送行知赴美留学并资助旅费。因此，他抱着“十扣财门一扇开”的精神，向亲友借贷，启行赴美。

秋，入伊利诺大学读市政学。（作者曾在晓庄见陶先生遗物中有任潮公1914年10月给行知的家信，说接九月来信知已入伊利诺大学）。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二十五岁

春，任潮公病故。后不久，长子宏生。

夏，在伊利诺大学得政治硕士学位。

秋，入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学，受教于实验主义教育家杜威，二年得教育文监（相当于硕士）学位。

行知实行勤工俭学，以劳役、卖稿、演讲来维持生活。归国时携回出国时所带的钱，他靠自己的劳动完成了三年的学业。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巳）二十七岁

秋，归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先后任教育原理、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主要是介绍外国教育的成果。（陶宏：《我和我的父亲》中说：三岁时父亲已从外国回来了，在南京高等师范教书。麦青：《陶行知》13页。）

九月，孙中山在广州出师北伐，护法战争开始。

十一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在校提出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的主张。他说：“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的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称教授为荣。他的方法叫教授法。他好象拿知识来赈济人的。我当时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席上辩论二小时，不能通过，我也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名义。”“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同事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这是实现教学合一的起源。”（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168页，以下简称《改造》）这是行知对中国教育改造的开端。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 戊午）二十八岁

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和教育专修科主任。
(罗炳之先生来信说：1918~1921年在南高教育科读书，陶先生兼科主任。)

讲演“生活与教育”。他说：“中国的教育太重书本，和生活没有联系。教育不通过生活是没有用的，需要生活的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而教育。”“为生活需要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是分不开的；以前进的生活提高落后的生活，以合理的生活改造不合理的生活，以有计划的生活克服无秩序的生活。”(辉子：《陶先生讲“生活教育创造史”》，《文汇报》1946年8月2日。这是1946年夏在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十一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发表演说，一九一九年一月在《新青年》五卷五号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传46页)

发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他认为试验教育能塞陈旧之道，开常新之源，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希望全国学者，尽刷依赖天工、沿袭旧法、仪型外国、率任己意、偶而尝试的旧习，一致以试验为主，则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改造》1~6页)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己未)二十九岁

春，发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指出生活的范围与教育同广，职业只是一种生活。他说：“生利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所需皆属之。其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有关于职业之生活，即有关于职业之教育；有关于消闲之生活，即

有关于消闲之教育；有关于社交之生活，即有关于社交之教育；有关于天然界之生活，即有关于天然界之教育。人之生活四，职业其一；人之教育四，职业教育其一。”（《改造》8页）他认为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农、工生有利之物，商、医生有利之事，同为利群。应根据生利原则安排教师、学生，使教与学皆得其宜，以实现“民无废才，群需可济”的目的。文中提出培养职业教师的几种方式，实发人之所未发。（《改造》9—20页）

春，应《时报》教育新思潮主干蒋梦麟之征，撰《教学合一》一文。这是行知关于教学改革的初步思想。他认为教师的责任在“教学生学”，所以“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怎样学就怎样教。”这即是把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联络起来。此外，“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如同柏林大学包尔孙先生说：德国大学的教员，就是科学家，科学家就是教员。德国学术发达，大半靠着这教学相长的精神。”这就是把教师的教和自己的学联络起来。所以要想得到教育英才的快乐，必须把教与学合一。更值得珍视的是行知在五四前夕即提出类似美国布鲁纳的“发现法”。他说：“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乃是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想，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得了这种经验理想，然后学生才能探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宿，对于世界一切真理，不难取之无尽，用之无穷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得，也就是现今教育家所主张的自

动。”（《改造》21—25页）

二月，《新教育》杂志创刊。

三月，蔡元培被聘为教育调查会委员，并被推为副会长。（《教育杂志》第十一卷，第四期）（蔡元培年谱）

南京教育界联合会成立，行知任会长。

五四运动爆发，民主与科学思想激荡全国。南京各校师生在小营演武厅集会，行知慷慨陈词，痛斥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听者泪下。

杜威来华讲学，宣扬民本主义，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主张。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庚申）三十岁

在《新教育》杂志发表《第一流教育家》一文。他认为第一流教育家，应敢探未发明的真理，而不是一举一动，乞灵古人，仿效外国；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我们教育者未尽到责任。这样的创造精神和开辟魄力正是行知一生所向往追求的。（《改造》27页）

夏，在南京高等师范举办第一届暑期学校，组织留校同学，每晚教邻近的平民识字。他在晚饭后，按时到校查看，和车夫小贩亲切谈话。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辛酉）三十一岁

三月，教育部聘蔡元培为东南大学校董。（蔡元培年谱）秋，南京高等师范改组为东南大学，行知任教育系主任。

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美国教育史专家孟禄来华，行知协同组织教育调查团，考查宁、沪、平、津等地的教育情况。

冬，“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蔡元培为董事长，行知为主任干事。该社是新教育共进社，教育调查会，《新教育》杂志社等团体为基础联合成立的。自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举行四次年会，讨论新学制（在济南），平民教育（在北平），收回教育权（在南京）及一般教育问题（在太原）。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三十二岁

四月二十五日，行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孟和、高一涵，胡适、张慰慈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有一个“好政府”，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是：（一）宪政的政府；（二）公开的政府；（三）有计划的政治。（《蔡元培年谱》《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八号）。

七月三日至八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年会，到会教育家三百余人，以学制改革为中心议题。（《蔡元培年谱》66页）。

发表《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一文，主张：应“虚心讨论研究试验，以构成面面顾到之学制；”对于国外学制的经验，应该明辨择善，决不可轻于从人；欢迎新学制的同时，要回头看看掉了东西没有；学制只是“前程万里的第一步。”（《改造》47—50页）。

这时期还发表《学生自治问题的研究》。他认为指导学生自治，组成集体，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是学校

的大事。有共同自治的学生，才有共同自治的公民，养成共和的人民，必须用自治的方法。在智育方面要学行并重，由实验实习以求理想与实际的联络，使学问深造；在德育方面最应注意实行，把道德与行为合一，而学生自治是重要的途径。所以学生自治如办得妥当，学校就成为伦理的实验室。学生自治在一定范围内，共同立法，共同执行，既合集体需要，又能深入有力，因而能够养成自觉的纪律。（《改造》31—45页）行知在这里提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学行并重，德行合一，是生活教育体系中的重要范畴。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三十三岁

夏，辞东南大学教授兼教育系主任职，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全家迁居北平。

秋，在南京的安徽教育界人士，利用在南京的安徽公产，创办南京安徽公学。行知被推为校长，姚文采先生为副校长。校址初在南京灯笼巷安徽会馆，继迁白下路上江考棚，解放后改为市立六中。他在这个学校最初提出“共同生活”原则，即师生同生活共甘苦，尊师爱生，以人教人；他深信这样共学、共事、共修养的方法是真正的教育。他亲书一联悬办公室：“义则居先，利则居后；敬其所长，恕其所短。”看来就是他那时的共同生活准则。

他认为应讲求教育效率。光阴与金钱都有限，该用才用，用必尽其效。但节约不是因陋就简，而是用最少的经费，较短的时间，办最好的教育。

他为这个学校提出三个教育目标：研究学问，要有科学

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美术的精神；处事应变，要有大丈夫的精神。他说：“我们要在必有事焉上下手。我们要以事为我们活动的中心。”（《改造》56页）

在教学合一原则指导下，教师不仅是要讲清楚教材的要义和难点，而且要指导学习方法，把点石成金的指头，知识宝库的钥匙交给学生。要用书本为工具，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学生要努力自学，教科书只是入门；教学应指导自学，课程不应分课内课外。他认真指导学生自治，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领导各种活动。

八月，在北平与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九月，到杭州，上海宣传平教。

十月六日，到南京协同王伯秋推动平民教育。参加平教会议，在金大讲《孔子纪念日与平民教育》，出席全市私塾教育会议。

十月十八日，到安庆推动平教。在一女师讲《女子领袖对于平民教育之使命》，向安庆全城学生讲《社会服务》，向全城和尚讲《平民教育与宗教》。

十一月十二日，给妹文漾信说：“我本来是一个中国平民，无奈几十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方向转移。……好在我的中国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象黄河决了堤，向中国的平民化的路上奔流回来了。”（《知行书信》）

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三十四岁

一月八日，在张家口参加察哈尔区平教会筹备活动。十

日与蒙古族学生开会，成立平教促进会。

二月二十五日，在徐州旅次写《自勉诗》：“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4月出版《行知诗歌集》17页，下简称《诗集》）

三月，在开封推行平教。向河南省县教育局局长讲平教，参加省平教会议，举行全城平教讲演会。

四月，在上海筹办《平民周刊》，改编《平民千字课本》。

七月，著《平民教育概论》。指出平民教育是“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银钱去教一般人民读好书，做好人”，是“到民间去的活动”，“到乡下去的活动”。

推行平教是用“平民读书处”的方式，自家门前也挂上“笑山平民读书处”的牌子。他指导家里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发现了“连环教学法”，是小先生制和即知即传原则的导源。同时他以身作则把平教送上劳动人民的门上去。

行知给朋友的信上说：“在实践中渐渐觉得平民教育的偶像也要打破，各地平民教育的影响，一百分之九十九只限于本地。……要想普遍地影响，就须普遍地办。”又说：

“知行自从亲自到民间打了几个滚，觉得有好多主观的意见都是错误的，没有成效的。”（《知行书信》）由此看来，这是他的普及教育实践从平民教育转向乡村教育的转折点。他的平民教育目的是“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使社会上的纵横阶级都能沟通。他以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热情，开辟教育大众化的方向，以平民化来化平民，为劳动人民争取教育权是值得赞许的；但企图用平民教育沟通社会阶级则是改良思想的表现。

夏，发表《半周岁燕子矶国民学校》一文。他认为该校有“事实化的理想，理想化的事实”。学校师生共同生活，既读书，又做事，校舍修理、环境卫生、校具制作、接待、炊事等，都是师生分任。並以学校为中心改造乡村社会，师生在燕子矶上下植树造林、开辟道路、建设公园、清除垃圾、移风易俗，使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由于校长的爱人任半义务性的教员，他们的勤朴家庭成为乡村家庭的模范，因而行知设想“未来的乡村学校最好是夫妻合办。”后来这个学校和南京安徽公学都成为筹办晓庄师范的基地。（《改造》57—64页）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三十五岁

发表《评陈著之家庭教育》一文。他说陈鹤琴先生新著是“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这本书受《戴佛的教育》一书的影响，戴佛小时通五国方言，九岁入大学，十四岁得哲学博士，十六岁得法律博士並任柏林大学教授，是大戴佛教育理想与实践的结果。《家庭教育》一书是陈先生对儿子一鸣教育理想与实践的科学归纳，可以说是《一鸣的教育》，它是试验教育在幼儿教育方面的一朵鲜花，所以行知赞扬备至。行知说：“父母不会教养，小孩子不晓得要冤枉哭多少回。……如果做父母的肯像陈先生这样细心教导儿童或是采用陈先生的教导方法，我敢说小孩子的眼泪可以省掉一万万八千万斤。”（《改造》65—74页）

冬，行知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学校：燕子矶小学、尧化门小学、笆斗山小学、中华门索墅小学、明陵小学、无锡河埭口小学等，互相参观，取长补短，对提高小学质量

取得良好效果。同时为创立晓庄师范作了组织和思想的准备。

十二月二十七日，给王西澂信：“改进社的色彩不是白的，不是黑的，不是红的，不是灰的——是透明的，水晶样透明，使各种光各种颜色都能透出真面目”。（《知行书信》）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三十六岁

这一年行知为了探讨乡村教育理论，筹建晓庄师范，作了大量工作。他与赵叔愚、邵仲馨到南京各处参观，写了《天将明之师范学校》、《无锡小学之新生命》等文，认为他们是有生活力的学校。

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学校在明陵小学开会，通过了《我们的信条》。这是行知一年来参观调查教育的总结，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他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信条共十八项，其中较重要的几条是：“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就是教育的出发点”，“教育应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教法学法做法合一”，“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教师应当以身作则”，“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这里面已形成了生活教育论的雏形，乡村教育论的初基。（《改

造》113页)

冬,发表《南京中等学校训育研究会》一文,就原理方面说,对学生品质培养有很大的意义。他认为训育工作者要在“事”上去指导学生修养品格;应当与学生同生活,共甘苦;应智识与品行合一,因为智识与品行是受同一的学习定律支配的。最后,他强调品行养成的关键在于引导学生在行动中能明辨善恶、是非、曲直、公私、义利,使他们能完满地参与现代人生切要的生活。训育工作者“要打破侦探的技术,丢开判官的面具。”也不是“查房间、管请假、记大过、发奖品就算了事。”(《改造》103页)

冬,发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他指出,儿童学证实:“凡人生所需之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换句话说,六岁以前是人生陶冶最重要的时期。”工厂首先是女工区、农村是幼儿园的新大陆。必须普及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园。用徒弟制(后来称艺友制)培养百万以上的幼儿师资,是普及幼儿教育迅速而节省的办法。(《改造》107页)

十二月,行知写下了乡村教育论的光辉篇章:《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奠定了乡村教育和师范教育改造的理论基础。

行知认为人的社会实际生活是学校的中心,学校是有选择的社会生活。“这种学校是与自然生活、社会生活联为一气的。他能适应环境的生活,也能改造环境的生活。”“自然、社会里的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师范学校;活的师范学校产生活的教师;活的教师产生有